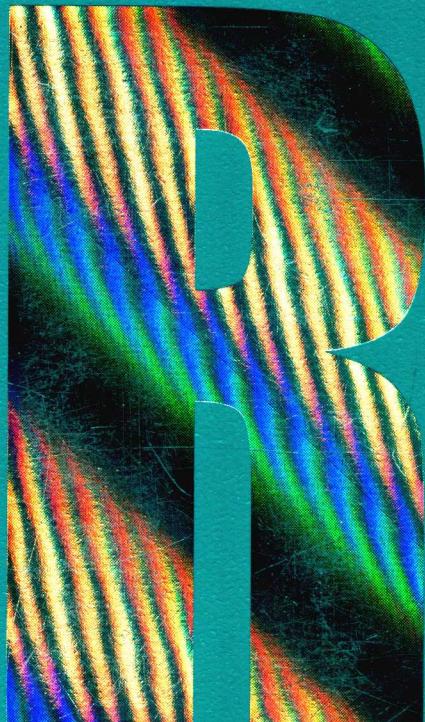


国关十人谈

王逸舟 张小明 赵梅 庄俊举 主编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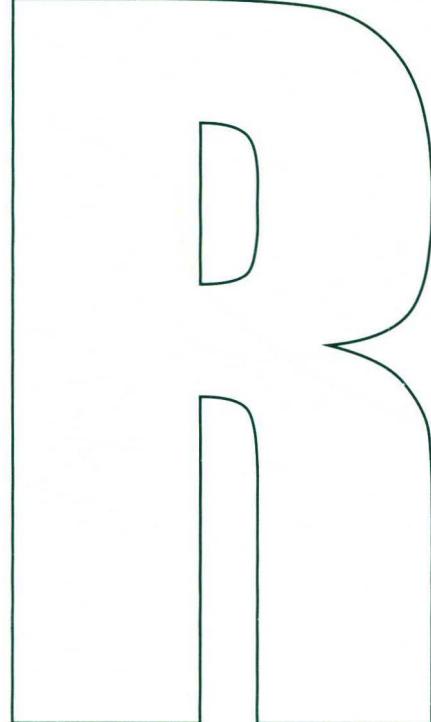
(第一辑)

专业的对话
睿智的思考

王存刚	李 滨	李英桃
田 野	袁正清	张小明
尹继武	刘 丰	庞 瑞
		张登及

国关十人谈

(第一辑)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王逸舟 张小明
赵 梅 庄俊举

主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关十人谈.第1辑/王逸舟等主编.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ISBN 978 - 7 - 208 - 15694 - 4

I. ①国… II. ①王… III. ①国际关系-文集 IV.
①D8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31858 号

责任编辑 王 冲

封面设计 陈 酣

国关十人谈(第一辑)

王逸舟 张小明 赵 梅 庄俊举 主编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191,000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5694 - 4/D · 3369

定 价 62.00 元

扎扎实实做学问

——《国关十人谈》小序

读者面前的这套系列书,是《国际政治研究》自 2014 年第 4 期开始以“专访:21 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政治的发展”为题所刊载文章的结集,主题是围绕 21 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各个分支的演进展开。

国际关系和外交在今日中国成了一门显学,从上到下似乎都看重它的功效,研究者也有更多的机会一展身手。然而,从学术工作本身考察,这里面存在不少泡沫水分,急功近利的东西有增多的趋势。不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浮躁现象,值得引起警惕和纠正。

鉴于此,《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尝试做一点努力,邀请一批中青年学者进行对话,从学科史和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就 21 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政治学界不同领域、特别是分支学科的主要成就和问题、现状与前景进行归纳、梳理和展望,以便从不同角度了解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整体画面和最新动向。这些访谈的突出特点是没有空话套话、不做评功摆好,重在发现问题、揭示矛

盾,用事实和数据说话,以冷静的眼光看待未来。

从刊发后的反响看,这些访谈受到读者和同行的好评,有各种被转载和引证的后续效应。从某种程度上讲,有关学科史的这些访谈,力戒假大空,鼓励了扎实做学问、坐冷板凳的治学态度,促进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反思。《国际政治研究》杂志感谢这些学者的贡献,我们也会始终坚守学术底线,做好应尽的工作。

有幸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关照,特别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潘丹榕老师、责任编辑王冲老师的协助。上面提到的专栏访谈,将以《国关十人谈》系列作品的方式,陆续与广大读者见面。真心期待这套书产生积极的反响,也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

王逸舟

2019年2月22日于北大

目 录

扎实实做学问	
——《国关十人谈》小序	王逸舟 / I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展与实践意蕴	
——王存刚教授访谈	刘毅 / 1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近况与实践	
——李滨教授访谈	刘毅 / 27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李英桃教授访谈	黄立志 / 56
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进展与问题	
——田野教授访谈	刘毅 / 85
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袁正清研究员访谈	曹德军 / 111
中国的“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研究	
——张小明教授访谈	刘毅 / 131
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进展与问题	
——尹继武教授访谈	王海媚 / 162

■ 国关十人谈(第一辑)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刘丰教授访谈

马 骞 /190

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进展与问题

——庞珣教授访谈

刘 毅 /228

国际关系研究在台湾

——张登及副教授访谈

黄立志 /251

编者按 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际政治发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变化。作为现实的一种折射,国际政治研究也有不少新的课题与新的困惑。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无疑是国际关系最新发展的主要动能之一,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自然也是国际学术共同体里面特别值得重视的一部分。本书以“专访:21 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政治的发展”为主题,由特约记者以访谈方式,邀请相关学者,对 21 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政治学界不同领域的主要成就和问题、现状与前景进行归纳、梳理和展望,以便从不同角度了解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整体画面和最新动向,促进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内部沟通并加强与外部的交流。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那么,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现状如何?后冷战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了怎样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中国的外交实践有哪些指导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存在哪些问题?其发展前景如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毅就上述议题专访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国际关系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存刚。王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发表相关论文多篇,目前正在撰写专著《国际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视角》。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进展与实践意蕴

——王存刚教授访谈

刘毅

一、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现状

刘毅(以下简称“刘”):在您看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现状如何?有哪些主要研究议题?

王存刚(以下简称“王”):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今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相应的研究队伍已经初具规模,人员构成比较多元;研究主题也很丰富,既有宏观研究,又有专题研究。

首先看一下这个领域的总体发展情况。在文献出版方面,这些年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文本大量出版,包括新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专题文集》等,以及《毛泽东外交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等。这些文本中包含了相当丰富的研究资源。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明研究员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基本原理》,依据专题形式,对于从马克思到胡锦涛有关国

际关系、外交的论述进行分类整理编纂,是该领域相当重要的一部基础文献。此外,国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著作的中文本也陆续在国内出版,作者包括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乔万尼·阿里吉,依附理论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安德烈·弗兰克,批判理论代表人物罗伯特·考克斯,传统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代表人物弗雷德·哈利迪,“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等等。在教学研究方面,一些高校和研究部门陆续成立了相关机构,设立了相关学科方向。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设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理论研究室,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都设置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向,并招收博士研究生。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研究队伍,年龄分布比较均衡。已经出版且有较大影响的学术专著主要有:中共中央党校张中云教授等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发展史研究》,山东师范大学李爱华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正毅教授的《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上海外国语大学郭树勇教授的《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复旦大学张建新教授的《激进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曹泳鑫研究员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学术论文散见于各种国际关系和外交研究的专业期刊上。值得一提的是,自 2004 年起,中央启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之后连续多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际问题研究类项目,都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的选题,资助力度也越来越大。

就国内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前沿领域而言,虽然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结构存在分歧,但对其主要范畴还是达成了基本共识,并有了一定深度的研究。

一是时代研究。时代观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特有范畴。已有的研究包括归纳经典作家的时代观,讨论时代观的意涵,解释时代观变迁的内在机理,分析时代观与国际关系及外交战略的关系,等等。不过,由于多方面原因,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陷入了停滞状态。二是帝国主义研究,包括诠释列宁、布哈林、考茨基、卢森堡等人的帝国主义理论,讨论帝国主义在现当代的各种表现形态,介绍国外帝国主义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三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与和平观研究。在战争观方面,包括运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基本原理,对当代战争根源、性质、特点和社会历史功能等内容进行系统研究,对“战争新理念”、战争的制胜因素等问题进行重新认识。与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研究相比,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和平观的讨论并不多。四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研究。主要涉及马克思、毛泽东和邓小平等对国家利益的论述。五是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研究。21世纪初,关于新安全观的讨论一度非常流行,近年来相关讨论主要围绕非传统安全、安全共同体、人的安全等问题展开。此外,一些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领袖的国家安全观进行了比较研究。六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观研究。这方面成果不多,只有个别学者涉猎。七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和谐世界、实现“中国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数量非常大。八是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路径、方法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数量不多。

九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比较研究。这方面研究成果的数量十分有限。

我在即将完成的《国际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视角》这本专著中，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归纳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国际关系的基本方法与目的”“时代论”“国际体系、国际秩序、世界格局论”“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论”“殖民主义与民族解放论”“对外政策与两制关系论”“战争与和平论”“全球化论”“文明多样性论”等十个方面。当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上述十个方面并不能完全将其涵盖。我希望以这个框架为基础，不断探索，不断完善。

刘：在您看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否具有某种核心特质或独有标识？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否具有本质区别？

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当今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研究方法、价值取向等方面确实存在本质差异。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并不是本质上的差异。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一种比较明确的“核心特质”，我认为，应该是对“解放”这一核心价值的不懈追寻。因为其他类型的国际关系理论受制于各自创设者的学术立场与研究方法，是不能或者不敢以“解放”作为自己终极追求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争取人类解放，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目标，需要在坚持道德与正义指向的前提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洞察国际事务的隐秘逻辑。

作为一种宏大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内部

也是流派纷呈。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对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的不同观察,以及各国的具体情况,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研究国际关系和外交问题。它们之间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区别,甚至在某些理论观点和现实判断上相互矛盾,但都属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组成部分,在本质上还是有相通之处的。我们不能人为或先入为主地区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将它们对立起来。事实上,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之间的互动与互鉴在不断加强。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儒家行动主义、集体意识、道德取向等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因此,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着非常便利的历史文化条件。

二、后冷战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刘:后冷战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低潮后再起”的历史过程。您怎样看待这一挫折历程?能否谈一谈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意义?

王:我觉得在这一问题上有很多误解。一是政治与社会运动的挫折,等于相关指导思想的失败。实际上,导致政治和社会运动失败的原因很多,不能仅仅把指导思想当作“顶缸者”。马

克思主义在 19 世纪至 20 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有着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在西方乃至全世界的话语场域中都处于“主流地位”。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马克思主义面临空前挑战，出现了所谓的“低潮”。但现实已经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它没有被空前的挑战所吞噬，而是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世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艰难探索中取得的思想成果，形成了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低潮后再起”的态势。这也再次说明，我们不能用一时的得失来审视某种理论的影响力，而应该有大历史观，从长远角度进行判别。

另一种误解是，马克思主义乃是一种“宇宙真理”，无须适应世界，只能由世界来适应它。这恐怕只能是一厢情愿。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要保持和扩大影响力，必须在立足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不懈努力，不断产生新的思想成果，并经受实践的检验。仅就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而言，我们不仅要在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等方面不断改进，还要积极回应国际关系和国家外交的现实需求，回应公众的种种困惑。马克思主义是在回应现实问题中发展的。只要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思想史，就不难发现，当年经典作家的很多文章和论述，都是在激烈的论战、重大的讨论和回应中诞生的。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一些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不少是很粗糙的，其中还包含“不敢指出、不便深入”的算计成分。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有巨大的发挥空间的。

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意义，之前的讨论中已有零星的涉及，这里我想再作一些补充。就整个学科而

言,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利于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健康发展与整体进步。学术发展史表明,理论范式、研究路径之间的竞争,对理论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理论范式和研究路径的多样化、不同理论流派间的平等对话大有益处。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深入辩难在先,进步和发展在后。鉴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潜在影响力和巨大解释力,其他学派的学者在研究工作中如果刻意漠视、绕开甚至排斥这一理论,受损的其实是相应理论本身及整个国际关系学科的生态和生命力。对中国而言,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助于构建“中国学派”。作为历史悠久、迅速成长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有着足够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独特性,需要有支撑其可持续发展、阐释其国际合法性的“学派”或思想元,需要有一整套系统而有独立品格的国际关系理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范畴、研究方法、理论观点,只能成为一种可借鉴的思想资源,但无法作出周延的解释。应当在中国悠久历史、丰富外交实践的基础上,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构建“中国学派”的重要动力。那种仅仅将“中国学派”的思想基础诉诸中国传统文化的取向,存在逻辑上的缺陷和现实的困境。

刘: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已经“终结”,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不能再承担国家对外政策正当性的建构任务。您怎样看待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王:这是一种流行的误解。我想举个例子。一次我参加南开大学主办的国际问题学术会议,做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现状的发言。当时适逢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发布,有学者提问:“你看,白皮书里面哪一句有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我的回应是:作为外宣文件,需要用国外公众、舆论界、政界能够

听得懂的语言和方式进行表达,也就是说需要做一点“权变”。但仔细研读不难发现,这个文本中所隐含的思想方法、问题视角,不同程度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在场”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讳言自己的“意识形态”,但会出于实践和策略方面的考量,使用“通用的”“普世的”话语形式阐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方面最新的例子,就是习主席在欧洲访问期间发表的系列演讲。在这些演讲中,习主席既很好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又使用了欧洲听众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体现出一种坚持自我、包容宽和的精神气度。现在一部分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一旦发现研究成果中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就会判定其为“非学术”、档次不高。此类看法和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偏见。实际上,意识形态本身是广泛存在的,美国、欧洲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只是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与我们不同而已。在这方面,我们不能落入西方的话语陷阱中。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可以承担起建构中国对外政策正当性的重任的,为此需要有学术定力,有创新勇气,树立“以我为主”的理论自信。主张理论自信,并不意味着盲目排斥西方主流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和相关有价值的案例,而是主张运用中国视角、中国案例对国际关系、外交事务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反对仅仅依靠西方视角、个别案例特别是西方案例就匆忙得出结论的做法。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文献《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序言里曾指出:“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

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种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这两段话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

主张理论自信,还意味着应该像康德所倡导的那样,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尽快“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避免“不经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具体地说,就是要彻底消除“研究问题都需要进口”的现象。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对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已经在国际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因而已经具备了产生本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基础。这种理论应该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相匹配、相契合。

刘:刚才您谈到了“理论”的重要性。然而,国际关系学界似乎有一种趋向,即“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更多涉及单元层次的具体问题和策略设计,导致宏大理论逐渐淡出。您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否受到影响?

王: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确实进入一个相对平淡的时期。回想十多年以前,西方三大主流理论先后被引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并且广受追捧,大批年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投身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并以三大主流理论作为自己学术上的依归。然而,短短几年过后,在三大主流理论发源地的美欧学术界,人们似乎已经开始厌倦大理论了,理论发展陷入相对停滞期。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学界突然感到,没有那么多外国理论可以拿来了。于是,原来以介绍西方理论见长的很多学者,或者开始转向,或者淡出该领域。这一过程表明,任何理论都要经受时间的